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企业 ESG 表现的规模经济效应

梁一鸣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省南京市，210023；

摘要：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表现日益成为金融市场投资和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指标。尽管众多文献考察了企业 ESG 表现的经济后果，但是对企业的规模与 ESG 评级的相关性仍缺乏研究。本文基于规模经济理论和合法性理论企业规模对 ESG 评级的影响，为企业管理层以及政府在战略决策时提供新的视角，为差异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ESG；企业规模；规模经济；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

DOI：10.69979/3060-8767.25.03.049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一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地球系统的维持相统一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企业作为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实体，与其相关的 ESG 概念也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是指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衡量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使企业和投资者、将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纳入其商业模式^[1]。ESG 最早出现于金融投资领域，1992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提出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表现纳入其决策过程，标志着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首次受到关注。2006 年，联合国社会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成立，ESG 作为一个统一概念被正式提出。E 是环境绩效，指采取有利于环境的政策和投资，例如实施污染控制措施；S 是社会绩效，指与利益相关者相关的社会政策，如社区投资、平等就业机会、工作安全等；G 是治理绩效，指采用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如 CEO 和董事长的角色分离以确保公司的决策符合股东的利益^[2]。

目前研究多关注与 ESG 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与可持续性金融的核心问题即可持续发展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的问题相一致。而探讨什么能够影响 ESG 评级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规模是企业的重要特征，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经济、环境、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表现都有显著差异。企业规模是处在动态变化中的，一个企业的扩张、收缩、拆分，多个企业的兼并重组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但这些变化大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其对 ESG 表现的影响如何并不清楚。研究企业规模对 ESG 的影响有助于企业管理层在战略决策时提供一个新

的视角，也有助于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环境政策时充分考虑企业规模因素，为差异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2 理论基础

规模经济理论描述了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大，使单位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该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劳动分工是在一定规模的批量生产基础上进行的，即分工和专业化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后由马歇尔、曼昆等学者将规模经济定义为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扩大而单位产出成本不断下降的现象。规模扩大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一体化程度等途径降低企业成本，例如大规模企业对企业的生产设备以及员工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生产效率、充分利用公用要素以及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以更好利用人才、降低管理成本。

合法性理论最早由马克斯·韦伯在政治学领域提出以用于讨论社会的秩序与规范，后由 Suchman 引入企业领域并提出组织合法性。他认为在企业和组织研究中，组织合法性是企业的行为在社会构建系统中的原则规范、价值观和信仰与定义中被认为是可取的、恰当与合适的一般感知和假设。对于本研究而言，公司通过满足社会期望来寻求组织合法性。大规模企业由于知名度高、业务能力出众等原因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期望，因此他们会更有动力去提升以 ESG 为代表的可持续性评级，以满足社会的高期望，寻求其合法性。

3 企业规模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3.1 企业规模的规模经济效应

企业规模与企业利润的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大的话

题。企业规模作为企业的内部特征，反映了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产品在企业内的集中度，与要素的资源配置水平和生产率密切相关^[3]。对于拥有高固定成本的企业例如制造业企业来说，通常通过“做大做强”来获得更多优势，而其“做大”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企业规模扩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现象，二是企业规模扩大带来的创新优势。

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他认为大规模企业拥有大量资金和资源以进行研发活动，因此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现有研究大多认为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这与熊彼特的创新假说相一致。由于企业在规模经济、风险分担和融资渠道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大企业比小企业具有的创新能力更强；由于企业的研发活动必须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来支持，因此拥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才会有更强的创新能力。

3.2 企业规模与环境绩效

现有研究通过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选取不同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样本进行研究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企业规模能够正向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多数研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于两者关系进行探讨，少数研究使用了文本分析、小样本案例研究等方法。何丽梅和侯涛^[4]依据全球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指南》量化评价了2008年我国112家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不高，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即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环境绩效越好；后续多项研究在此基础上扩大时间跨度和样本量，同样得出公司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绩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

也有研究进一步探究企业规模和环境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通常认为大规模企业拥有更高的知识水平^[5]和资源水平^[6]。一方面，拥有更高知识水平的大规模企业对环境管理系统等可持续性管理工具拥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拥有更多资源的大规模企业更易在生产、销售等过程中采取更为节能的环保方式，这种环保投入能够促进其在环境绩效方面拥有更好的表现；此外，相较于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新建使用环保设施的成本占比较低，因此其更有能力和动力提升其环境绩效。

3.3 企业规模与社会绩效

社会绩效方面，相关研究也得出了正相关的一致性

结论。早在1987年，一篇基于类型学和频率分析的研究就提出企业规模对社会绩效有重大影响，但是这篇文章将企业和社会方面的表现简单视为公司披露数量，虽然披露数量可以一定程度反应企业披露水平，但也会因为忽略披露质量导致一定程度的局限性^[7]。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供需模型弥补其不足，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取决于其规模、多元化水平、研发、广告、政府销售等多个因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来自不同市场以及不同行业的企业规模对社会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对其进行机制分析，现有文章多认为大规模企业拥有更大的知名度和更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因此这些大规模企业收到更大的政治、监管以及社会压力，为了回应这些压力以及减少政治成本，大规模企业披露更多的信息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此外，与企业规模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类似，早期学者也使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企业社会责任支出作为衡量企业社会绩效的替代变量。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社会绩效的测量逐渐由使用替代变量转变为用多维度指标进行测量，这与ESG指标评价体系的方法论有类似之处。

3.4 企业规模与公司治理绩效

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相关研究大多肯定了企业规模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依靠企业技术效率、企业数字化程度以及企业研发等途径发挥作用。从企业技术效率角度分析，企业规模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技术效率从而正向提高企业职工工资，而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反应了公司治理能力的增强；从企业数字化程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例如管理制度完备化、组织结构清晰化和人才储备充足化；从企业研发角度来看，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研发投入产生影响，而研发投入作为企业自由裁量权的替代变量可以反应企业治理绩效——短视管理者降低研发支出以满足短期盈利目标，而具有卓越治理能力的管理者能够加大研发进行投入以推动企业长期盈利。值得一提的是，Benito^[8]认为公司国际化和多元化经营的战略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公司治理能力，而企业规模能够影响公司国际化和公司绩效之间的联系：大型规模企业呈S曲线关系，中型企业呈U型关系，小型企业呈线性负相关关系。文章明确指出，企业规模在研究中通常被用作控制变量，但是很多管理情境是由企业规模驱动的，

因此在未来研究中要关注企业规模这一变量。

此外,也有学者呼吁应当对于环境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关注,提升其评价体系的全面性和科学性^[9]。目前研究对于环境绩效评价和指标的深入研究仍然缺乏,因此未来在理论与实践应该采用更加科学的衡量体系例如 ESG 评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规模经济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讨论了企业规模与 ESG 评级之间的关系。对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大规模企业拥有更高的知名度,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期望,高知名度带来的是更高的社会期待和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因此他们会更有动力去提升以 ESG 评级为代表的可持续性能力以回应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期待;二是大规模企业具有拥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规模经济优势,高知识水平使大规模企业比小规模企业更早关注到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同时对于可持续性管理工具有更多的了解,而规模经济优势使企业在生产运营以及对于新业务投入时拥有更低的成本,使得大规模企业更有能力提升以 ESG 评级为代表的可持续性能力。

自 2020 年 9 月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中国对 ESG 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社会各界更加关注企业的 ESG 表现^[10]。在双碳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政府和企业作为宏观主体和微观主体应当共同努力,为推动双碳战略目标实现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助力。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统一健全 ESG 相关信息的披露标准,提高披露要求,不断向强制披露转型。本文论证了企业规模能够正向影响 ESG 评级,这为 ESG 的衡量维度的扩充与完善提供思路,例如在衡量企业可持续性时将企业规模作为一个考量因素。此外,2018 年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披露有关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内容,目前中国企业仍采取“不披露就解释”的披露模式,这种披露模式对于是否披露进行要求,但未对披露内容与质量进行规定。因此应当尽快统一披露标准,提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质量。同时,应当协助企业在生产经营全程树

立 ESG 等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二,统一 ESG 评价体系,提升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有研究将企业规模对 ESG 的正向影响解释为:大规模公司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收集和报告 ESG 数据以得到更高的评级。这意味着更好的 ESG 分数并不反映更好的可持续性绩效,而是反映更好的报告数据绩效,从而对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产生质疑。此外,目前世界范围内的 ESG 评级机构有上百家,各家评级机构拥有不同的标准和方法论,并且多数评价标准源自于西方国家。ESG 作为外来概念,引入国内时应当注重与中国企业管理实际相结合,推动完善相关数据库建设,打造出更加科学、准确、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 ESG 评价体系。

第三,积极加强企业交流,促进经验共享,合力推动企业换挡提速、转型升级。本文得出企业规模与企业 ESG 评级之间呈正相关的结论,因此大规模企业拥有更好的 ESG 评级,其有能力且有义务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企业应当积极进行经验共享,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大规模企业由于其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和社会期待,更应当充分发挥其社会影响力,与中小企业一同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 [1] 孙晓华,王昀. 企业规模对生产率及其差异的影响——来自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Z]//孙晓华,王昀. 中国工业经济. 2014:57-69. 10. 19581/j. cnki. ciejournal. 2014. 05. 005
- [2] 何丽梅,侯涛.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 [3] 王虹雨. 绿色发展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规模的调节效应[J]. 科技创业月刊, 2023, 36(02): 21-6.
- [4] 毛其淋,王玥清. ESG 的就业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23, 58(07): 86-103.

作者简介: 梁一鸣(2000-), 男, 汉族, 河南洛阳人,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